

西安事变
与抗日战争

文集

西安事变与抗日救国斗争文集

陈超超

西安事变与抗日战争文集

(江苏文史资料第 22 辑附录)

《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

(南京长江路 292 号 邮编 210018)

南京雷鸣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10 月)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 印张: 13 字数: 340 千字

● 印数: 1000 册

CN 32—1287/K
ISSN 1003—9473

定价: 18 元

主 编:吴 镭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晓宁	朱宝琴	孙宅巍	苏仲波	杨颖奇
吴志明	姜 平	姜志良	贾宗荣	

序 言

历史是最严厉而公正的审判官。越是经过时间的洗炼，就越能显示出历史的真相。

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事件都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有时是几百上千年，缓缓流淌，平淡无奇的；有时却在一两天内，惊涛骇浪，力震寰宇，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一天等于二十年”，决非夸张。

1936年的“双十二事变”，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众多事件中一桩突出的剧变。通过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中华团结抗日的局面得以形成；长达十年的国内战争得以结束；在民族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扭转了危局，宣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发展壮大了中国国民党内部抗日进步的力量，是一曲伟大的历史凯歌。当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多方面地展示出它的历史意义，历时弥久，业迹弥新。六十年，一个甲子过去了。回头看看，可以更客观地审视当时的情势和事变过程，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判断，总结是非得失与经验教训，以为殷鉴。同时，也以此来缅怀为那次事变作出历史贡献的前辈英灵，感念尚在人世的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文集》精选论文54篇，篇篇论文，瓣瓣心香，寄托情思。或有所创见，或有所思辨，亦均经深思熟虑，乃成一家之言。集思广益，蔚为大观，可以一读。掩卷深思，必有所得，因以为序。

吴 镕

1996年夏

目 录

序言	吴 榕 (1)
----------	---------

停止内战 共同抗日

——试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动因	王家云 (1)
简论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李雅琴 翟爱东 (9)
华清池捉蒋真相及其查清过程	王文成 (12)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简析	朱广东 (20)
略论西安事变前后红军的宣传工作	刘正斌 (22)
西安事变与卢沟桥事变	苏黎明 (30)
把握历史转折点的人	

——论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高超艺术

.....	邵景元 丁文富 (40)
-------	--------------

襟怀坦荡 披肝沥胆

——浅议周恩来西安事变前后谈判技巧的运用

.....	秦九凤 华宗宝 (50)
简议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活动	黄德荣 (56)
周恩来与西安事变	李淮成 (60)
宋绮云与西安事变	吴志明 (67)
殚精竭虑 稳住阵脚	

——浅议张杨在西安事变中的军政措施 梁仲明 (75) |

试论张学良的性格对西安事变及其晚年悲剧的影响

.....	周慧平 (83)
张学良“送蒋返京”举措之评析	季云飞 (92)

张学良陪蒋回宁的原因及影响	唐 萍 (100)
西安事变时期蒋介石心态演变浅析	汪天亮 (105)
宋美龄与西安事变	戚厚杰 (109)
论西安事变前后的汪精卫	朱宝琴 (115)
陈诚与西安事变	孙宅巍 (126)
阎锡山在西安事变中	蒋顺兴 (134)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和意义

..... 王 芳 邵超雄 (143)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拥蒋方针	杨颖奇 (149)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处理抗战中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	

关系的

试论党在抗战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	王 强 (161)
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式、经验及启示	刘飞燕 (166)
争取尽可能多的抗日同盟者	陈 蓉 (170)
论抗日战争中的爱国主义	徐梁伯 (172)
抗战时期中共外交政策及其实践	花亚纯 (181)
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	

——毛泽东等谋求与美国合作尝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对美的外交活动	吴远隆 (198)
-------------------------	-----------

略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过程	徐报喜 (201)
简述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与国民党的合作	曹晋杰 (205)
敌后根据地是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王骅书 (211)
刘少奇在苏北的主要功绩	倪士干 黄俊才 常德善 (218)
刘少奇对黄桥决战军事策略制定的贡献	

..... 王世谊 胡正勃 (223)

周利生 刘江船 (228)
试论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农业政策
钱戈天 (233)
江苏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成就

抗日战争时期盐阜区的邮政与邮票	陈肇彦 (237)
抗战时期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述评	吴恒心 (242)
黄炎培等访问延安与《延安归来》的出版	姜 平 (252)
论蒋介石的抗战态度	张庆军 (262)
国共两党对日持久战思想之比较	顾莹惠 朱蓉蓉 (273)
日本南进与蒋介石的远征战略	王晓华 (278)
史迪威将军与1942年的缅甸战役	王楚英 (288)
中国铁路系统的抗战准备	王卫星 (302)
试述西南后方基地在抗日持久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龚怀林 (308)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财税政策	姜 伟 (317)
新疆问题与战时中苏关系	王 鹏 (325)
北海事件引起的中日外交风波	谷小水 (333)
抗战期间的外国教会与传教士	蒋晓星 (340)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段月萍 (350)
周恩来与国统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运动	孙金科 孙小明 (360)
日本对华侵略特点探析	曹 峻 (363)
日本战后对侵略战争罪责的错误态度 ——兼与战后德国态度比较	李 荣 (370)
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15年的历史回顾	苏仲波 (381)
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 顾问、会长、秘书长名单	(390)
编 后	(393)

停止内战 共同抗日

——试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动因

王家云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动因何在？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观点歧异。笔者试就此作些探讨，以求说明这一事变发生乃至和平解决的历史必然性，并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

近些年，不少学者从事物运动的一果多因与合力作用的角度，对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和具体历史人物，作了诸多有益的探讨。但是，读后总感到有些不足，即没有着力去揭示“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也就是说没有“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①

我以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全国人民对此无不感到痛心疾首，迫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才是事变发生乃至和平解决的真实动因。

西安事变的前一年，即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指出：当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对东北人民进行血腥的军事镇压、野蛮的军事统治，而且还实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垄断东北的经济命脉，榨取东北人民脂膏，同时还施展恶毒的奴化教育，即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阶段。不过，那时的侵略还只限于东北。之后，特别是到了1935年，情况明显不同了。日本帝

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相继利用军事讹诈，攫取冀察两省主权，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最近的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②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于是，从1935年开始直至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在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事变都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间，“学生界、文化界、舆论界的救亡运动，红军的进入西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海和青岛的反日罢工，英国对日政策之趋向比较的强硬，两广事变，绥远战争和绥绥运动，南京在中日谈判中的比较强硬的态度，西安事变，最后是南京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这些事变，……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③显然，其间发生的西安事变乃至事变的和平解决，最深刻的历史动因是，面对日益严重的中日民族矛盾，全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有联系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与具体的历史人物，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无论是积极主动的还是消极被动的，都是对这一主要矛盾作出的反应，是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政治主张的回应，这才是他们各种动机背后隐藏着的真实动因。如果忽视这一动因的揭示，则无法科学地说明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必然性。

二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并期望和平解决的历史动因是什么？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希望蒋介石改弦易辙，“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于敌手。代人受过、有着“不抵抗将军”骂名之辱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深感难辞其咎，虽有违令抗日之举，但终究无补于大局，且被迫下野，出游国外。回国后，他虽多次请缨抗日，但均遭国民党政府的掣肘；后被迫“围剿”红军，又屡遭惨败。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步步深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而国内内战不休，爱国获罪，举国痛愤。本有着杀父之仇、毁家之难、流亡之苦的张学良，更感到民族危亡之痛。“我们的隐忍，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近来国际情事，越发危急，我们不再起向我们最大的敌人反攻，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①

出生贫苦农民家庭的西北军统帅杨虎城，早年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极为不满。他虽也曾多次要求抗日，但均遭冷遇，反而被迫去“围剿”红军。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肆虐，国人的自相残杀，他每每感到悔恨交加。“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亡国灭种的惨败就在目前了！所谓‘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到甚么‘攘外’吗？”^②抗日，才有出路；打内战，则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其它再也没有出路了。

此时适逢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积极开展对东北军与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红军、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共同要求，于是，很快形成西北“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为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张、杨二将军再三劝说蒋介石，涕泣进谏，但屡遭重斥，不得已实行兵谏。其良苦用心是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尽快“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事变后，张、杨二将军立即通电全国，提出旨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八项主张。他们强调事变的目的“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

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行得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⑥

为此，张、杨在部署事变中慎之又慎，确保蒋介石的安全。事变后，积极联合各方，促蒋反省，盼其纳谏。为此，他们甘受惩处。张学良曾表示，如有闪失，愿让杨虎城提着自己的脑袋去请罪。为此，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当他在南京被扣时，又真诚地劝阻西安的杨虎城与东北军，强调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又引起内战。总之，在张、杨二将军看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唯此唯大。

三

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归根到底还在于蒋介石接受了张、杨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宗旨的八项主张。

诚然，“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顽固地执行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加紧“剿共”，致使国土沦丧、民情鼎沸，直至自己被扣。正如事变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联名发出的《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所指出：事变“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之结果”，^⑦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但是，作为英美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损害其自身利益时，他也有摆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特别是华北事变后，日本的加紧侵略，直接损害了英美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当权派的利益，蒋介石被迫调整其内外政策。他不仅否认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所谓“调整日中关系三原则”，在与日本会谈中有意拖延，致使会谈不得结果，而且还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强硬态度。尤其是为了联苏抗日，他开始考虑容共问题，他表示“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很高兴”。^⑧在他的授意下，

宋子文、陈立夫、陈果夫等分别派出代表在国内寻找与中共联系的线索，并开始与中共代表接触、密谈。国民党的五届二中全会指出：“内外环境，弥感艰危，举国同胞在极度烦闷痛苦之中，共赴国难之精诚，日益深著，国人所殷切期望于本党者，为如何统一人民救国之意志与力量，以御当前之外侮，而保民族之生存；而本党之所为坚忍负责，致其最大之努力者，亦以是为鹄的”。^⑨由此可见，尽管蒋介石还没有彻底放弃“剿共”之错误政策，但是至少表明他有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基本愿望，事变也因此有了和平解决的基础。

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反省，尽管还存在着一些疑虑，但在权衡利弊之后，还是接受了张、杨要求，派蒋鼎文持手谕令南京停止轰炸，并要蒋鼎文示意“各方镇静，停止谩骂”，明确表示“中国不应再有无意识之内战”。^⑩

近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国民党要人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对事变和平解决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在承认他们所起作用时，应该指出这些国民党要人居间缓和矛盾，抑制内战，也有他们对中日民族矛盾的基本认识，而且都是在蒋介石首肯的前提下进行的；一些地方实力派对事变和平解决大多也是出于“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的考虑，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前首肯纳谏，以“领袖人格担保”，口头承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六点意见，并对张、杨表示：“今天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⑪对此，毛泽东曾给予充分肯定：“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⑫

四

中国共产党积极协助和调解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就是为了实现中共自身提出的、反映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9月20日，中共中央即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华北事变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2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东渡黄河、准备同日军直接作战，结果遭到阎锡山军队拦截。为顾全大局，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共方面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公开放弃反蒋的口号，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再度申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建立与国民党合作关系的诚意。9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⑬与此同时，开始了国共两党高层的接触。9月22日，周恩来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⑭

中共中央获悉西安事变消息后，以民族利益为重，以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迅速作出判断与决策，认为这是一次为了抗日而发动的“革命行动”，同时初步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以求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局面的尽快形成。12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及我们的行动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电》中指出：“日本决定压迫南京扩大内战，俾遂其灭亡我国之谋，南京一部分亲日分子接受日本指示，继续发展蒋氏对外和平对内战争之政策，准备向西北大举压迫，然全国民众、国民党之大多数、各省有力军人无不渴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热烈欢迎西安之抗日起义，反对日本汉奸之阴谋。”次日，上述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红军愿“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⑤。

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一行抵达西安后，与张、杨二将军很快取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致意见，并积极协助与调解，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努力协调，是认为就当时形势论，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独立，再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正如中共中央在12月19日《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所分析的那样，事变发展可能出现两种前途，即或者由于这一发动，造成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从此结束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以早日实现。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要争取后一个前途，即“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⑥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促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的发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页。

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254、254页。

④⑤《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5页。

⑥1936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

- ⑦⑮《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4期第10—11、38页。
- ⑧《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28页。
- 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08页。
- ⑩《历史档案》1986年第2期第50页。
- ⑪《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73页。
- ⑬《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 ⑭《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 ⑯《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作者单位：淮阴师专党委宣传部)

简论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李雅琴 翟爱东

西安事变在中华民族抗日史上居有重要地位。它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系由多方面的原因所促成。

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召唤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一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日军于一夜间攻占沈阳，仅4个多月，即侵占了东北全境；1932年1月，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将战火烧到上海，并在这一年炮制了伪满洲国；1935年6月，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控制了察、冀两省；此后，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加紧对华北的经济掠夺。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召唤着全国的一切党派和政治力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中共抗日救亡政策的影响

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共于“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武装抵抗日军的侵略；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积极领导人民大力支援上海抗战；4月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尽可能地组织千百万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1935年，中共北方局组织领导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将全国爱国民主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5月到12月间，为了团结只愿抗日不想反蒋的国民党人士，为了有利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中央开始了策略的转